

毛泽东与徐特立 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

□ 叶 松

1913年春，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。翌年，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毛泽东被编入本科第8班。

在这里，毛泽东开始了与徐特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，他们为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苦苦求索，这对师生互为导师、相互影响，共同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。

“用教育来改革人心”

1913年，36岁的徐特立已是享誉湖南教育界的“长沙王”，而此时20岁的毛泽东正在寻求真理和志向。若“十年未得真理，即十年无志；终身未得，即终身无志”，他对这位断指血书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老师早有耳闻。这一年，徐特立被聘请为学校教员，教授教育学、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。

从1913年到1919年，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6年。而毛泽东从1913年到1918年暑期毕业，前后共做了5年半的师范生。其间，徐特立渊博的知识、进步的思想、高尚的品德，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相当的帮助和影响。毛泽东曾说：“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，最敬佩的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杨怀中先生，一位是徐老。”

徐特立教育学生，非常注重言教与身教相一致。早在1911年，徐特立任善化第一高小校长时，决意“用教育来改革人心”。1912年他曾与姜济寰（时任长沙县知事）相商，拟在全县办1000所国民小学，为此他创办长沙师范，任首届校长。在湖南一师兼课期间，徐特立总是步行往返长沙师范学校，路程十余里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他总是坚持步行。徐特立担任校长，一个月拿20元工资，他把所得工资用来投资教育，几年下来欠债六七百元，人们说他“傻”，给他起了一个诨名“徐二锅锅”，对此，毛泽东曾有精辟的见解：

徐先生办长师，不顾利害，不怕牺牲，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。这是那些自命聪明，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，所以笑他傻。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，惯于摆烂摊子，顶烂斗笠；在没有一间房子、没有钱的情况下，居然创办一所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，这真是锅锅精神。这种对他的讥笑，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。

毛泽东十分推崇徐特立老师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的学习方法。徐特立认为：“读书要守一个‘少’字诀，不怕书看得少，但必须看懂看透。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，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，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，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。”毛泽东勤于做笔记，当时他有许许多多笔记本，包括听课、自学、摘抄、随感和日记等积了好几网篮。

1919年5月4日，五四运动爆发，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，徐特立感到“国家有前途、有办法，自己也觉得年轻了”。在毛泽东领导的“驱张运动”中，徐特立通过健学会带领教师向张敬尧索薪，并在城乡揭露张氏兄弟的罪恶，其后张敬尧以“通匪”罪通缉徐特立。是年9月28日，徐特立乘法国“波多斯”号货轮赴法勤工俭学。师生一别就是多年，再见面时，国内的革命形势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1926年12月中旬，徐特立在长沙望麓园与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会面，师生促膝长谈，探讨国家的命运走向。徐特立向学生介绍了法国、比利时、德国的教育相关情况。毛泽东向老师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、宗旨、目的、目标和他对革命方法、手段、道路的探索性意见，并向老师建议“走出书斋，到工人中去”，“到农民中去考察一下，体验一下”，看一看农村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。

1927年春，徐特立到长沙县五美乡进行了一周的调查，他发现农村“一切权力归农会”，在农民协会的作用下，农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久，徐特立放弃了他奉行多年的“教育救国论”，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。

“坚强的老战士”
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，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5月，在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危局下，50岁的徐特立由李维汉介绍，经省委负责人彭公达批准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徐特立在党组织里“真正获得了新生”。

同年7月，徐特立同老友朱剑凡来到武汉，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了他的学生毛泽东。徐特立听从了学生的意见，动身前往湖南，以团结更多的进步人士跟共产党走。之后，

徐特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，他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，兼任党务整顿委员会委员。起义部队遇到重大挫折后，队伍南下，他任第20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。1928年5月，徐特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1930年12月30日，53岁的徐特立风尘仆仆、昼伏夜行，终于来到中央苏区宁都小布，指挥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毛泽东、朱德热情地迎接了徐特立。师生久别重逢，倍感亲切，一见面，毛泽东就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：“徐老呀，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！”

其后，徐特立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苏区教育工作，提出“老公教老婆，儿子教父亲，秘书教主席，马夫教马夫，伙夫教伙夫，识字的教不识字的”扫盲方法。徐特立回忆说，毛泽东很关心当时的识字运动，为着“怎样教文盲写字，模范字怎样写法”，就曾跟他讨论两次，直到彻底得到解决才结束讨论。
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。57岁的徐特立与董必武、林伯渠、谢觉哉等编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，从瑞金出发长征。

1937年1月31日（农历12月19日）是徐特立60大寿。毛泽东早在1月30日就为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。信中说：“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，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，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。”贺信称赞徐特立是“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”，总是拣难事做，从来也不躲避责任；祝愿他健康长寿，“成为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楷模”。毛泽东的这封贺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坚定不移、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。

抗战胜利后，随着蒋介石“假和平，真独裁”面目的揭露，解放战争随之爆发。正值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延安之际，中央决定隆重举行徐特立70大寿庆典，以显示边区军民从容不迫、临危不惧的气度，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信心。

1947年1月10日，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，来到中央大礼堂，参加徐特立的祝寿大会。大会由朱德主持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会祝贺。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信。贺信称徐特立“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”，“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”，把徐特立的“一切优秀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”。毛泽东为徐特立70大

寿题词：“坚强的老战士”。

3月，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，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。徐特立根据工作安排，到华北解放区工作。

“毛主席是我的老师”

在撤离延安前几天，毛泽东来到杨家岭徐特立的住处，询问老师需要什么。徐特立的干女儿徐乾知道毛泽东有两个热水壶，考虑到徐老年事已高，一路需要喝些热水，便脱口而出说需要一个热水瓶。毛泽东笑着点点头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毛泽东走后，徐特立严厉批评徐乾不该向主席要热水瓶，说：“毛主席很辛苦，又在斗争最前线，更加需要，我要什么热水瓶呢？”不一会儿，毛泽东捧着热水瓶来了。当得知徐乾受到批评后，毛泽东对老师说：“徐乾做得对，不应该批评，我还要表扬她呢！”同时，毛泽东再三叮嘱老师：“年纪大了，沿途要骑牲口，少走点路。”毛泽东对老师的爱护之心可见一斑。

徐特立非常敬佩他的这位有着救国救民理想的学生。一次，徐特立听见有人对他孙女说：“你爷爷是毛主席的老师。”他连忙摆手说：“快莫这么说，快莫这么说，毛主席是我的老师。毛主席年轻的时候，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，听过我的课，我只是他的一日之师，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。在旧社会，我想对人民贡献一点力量，但摸索了几十年，找不到出路。1927年我读了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得到启发，看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，就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懂得了革命，从此以后，我总是向毛主席学习。”徐特立不居功，不扬己，不以主席的老师自居，而是处处以身作则，教育身边的人。

毛泽东尊师敬贤，对老师关心、爱戴，永做学生的谦虚态度始终如一。徐特立博学多闻、谦虚好学，在毛泽东的影响下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成长为“坚强的老战士”。1968年11月28日，徐特立逝世后，中共中央的悼词上评价他是“光荣的一生，革命的一生，伟大的一生”。

（摘自2017年第3期《红岩春秋》，原标题为《毛泽东与徐特立：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》）

1935年9月18日，翻越雪山、涉过草地的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，占领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。在这个商铺林立的镇上，饥饿劳累的红军得到休养补给。

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，毛泽东就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在镇上收集“近期和比较近期”的报纸、杂志。侦察连占领哈达铺时，在一名刚从兰州回来的敌少校副官所带物品中搜到几张近期的报纸，便连忙交给了聂荣臻。

聂荣臻在其中一张《晋阳日报》上读到：“陕北刘志丹‘匪’部已占领六座县城，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，游击队、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，窥视晋西北，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。并可能与徐海东部会合。”报纸还附有一张所谓“匪区”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。聂荣臻立即派人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，叶剑英看了后将报纸送给毛泽东。

毛泽东看完报纸后，兴奋地说：“好了！好了！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。”

中央到达哈达铺后，侦察连又送来一大捆从镇上邮政所中找到的报纸，主要是7至8月的天津《大公报》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等人从报纸中，读到了更多的红25军、红26军的活动情况，以及红军在陕甘甘地区保存、发展了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消息。这使得毛泽东、张闻天等人初步定下了到陕北落脚的决心。

在这期间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贾拓夫。贾拓夫是神木县人，16岁就参加革命，20岁时就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、秘书长，负责省委组织、宣传工作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人一连几天倾听贾拓夫介绍陕西的情况及他掌握的刘志丹、谢子长等人的情况，终于将报纸上的报道和陕北的实际状况联系了起来。

22日下午，在团以上干部会议

林伯渠： 革命一生 奉献一生

□ 袁汝婷

1920年8月，林伯渠经李大钊、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，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。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，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、财政部部长，并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。

参加长征时，林伯渠已年近百。每次行军，林伯渠总是一手提小马灯，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，照顾着同志们。红军女战

几张报纸帮助 中央红军确定落脚点

□ 白 亮

上，毛泽东动情地说：“感谢国民党报纸，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。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，还有徐海东的红军，红25军已经到达那里了，我们要抗日，首先要到陕北去，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，那里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。”

（摘自2016年9月18日《陕西日报》）



士李坚贞回忆说：“他的小马灯从来不个人占用，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。”

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，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。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。

林伯渠同志的一生是彻底革命的一生，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。

（摘自2019年8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20世纪30年代初，在父亲谢子长的指引下，我家的男丁都参加了红军，我那时只有几岁，但也随兄长为红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回想起来，那一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高兴最开心的。

现根据我的记忆结合见闻写成此文，以怀念我的父亲和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们。

播撒革命火种

1897年元月19日，谢子长诞生于陕西省安定县（今子长县）枣树坪一个农家。1921年夏，谢子长投笔从戎，到山西太原学习军事。1923年6月，他以优异的成绩在“学兵团”结业，到河南、北平、天津等地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

1924年春，谢子长回到家乡创办安定县民团，任“团总”。他带领民团剿灭土匪、惩办土豪劣绅、禁止军队任意拉差，被群众称为“谢青天”。此外，他还帮助学兵团同学李象九成立“学兵连”，学兵连和安定县民团后分别改编为石谦团第三、十二连，李象九和谢子长分别任连长。

1925年冬，谢子长联络李象九、史唯然等再次奔赴北平和天津，受教于共产党人李大钊、刘伯庄、耿炳光等人。不久，经白超然和白志诚介绍，谢子长在北大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27年春，谢子长率部进驻安定县城，协助建立了中共安定特别支部。谢子长组织召开“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”，主持制定了《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》《农民协会案》等8个决议案和《安定县农民协会章程》，

怀念我的父亲谢子长

□ 谢绍明

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还在全县成立了1个县级、14个区级、100多个村级的农民协会，9个党支部。农民运动在安定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，陕北的革命火种得以播撒。

粉碎两次“围剿”

1934年1月，谢子长回到陕北。当时，陕北党组织和游击队受到敌人的血腥镇压，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。谢子长经历了无数艰险，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。3月8日，他恢复了陕北红一支队。4个月后，在安定阳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，谢子长任总指挥，郭洪涛任政委，贺晋年任参谋长。

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“围剿”和转交中央给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信，谢子长率陕北一、二、五支队南下，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。

7月25日召开了红二十六军、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及陕北特委的联席会议。在会议上，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、中央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两封指示信。会议决定由谢子长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，

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到陕北，配合陕北军民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“围剿”。

会后，谢子长率部队北上，先后取得了安定景武场、清涧县张家圪台、清涧河口镇战斗的胜利。在清涧河口镇战斗中，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，但依然带伤指挥部队作战。在胜利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“围剿”后，谢子长由于伤势过重，再也无法坚持工作，暂时离队养伤。

1934年初夏的一天，谢子长在谈起家里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时，告诉我们的说：“共产党人就像毛脑髓树一样，割了这茬，那一茬还会长出来。二哥和同志们虽然有的被杀害了，有的被关进监牢，我还活着。咱们家，整个陕北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员。共产党是杀不绝的，红军会更强大。”

当年9月5日，谢子长给中央北方代表写信，汇报了回西北后的工作和恢复陕北红一支队、整顿红二十六军的任务完成情况。不久，谢子长由于伤势严重，无法履行红四十二师政委职责，于是建议由张秀山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。

10月，北方局巡视员黄瀚（张子华）到陕北视察工作。黄瀚在郭洪涛陪同下来到阳道峁看望养伤的谢子长。他们就谢子长和陕北特委对陕

北、陕甘边党政统一领导和红军统一指挥的建议交换了意见。为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“围剿”，谢子长推荐刘志丹来指挥两支红军作战。黄瀚将谢子长的建议带到北平，在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后，随即给陕北特委写信，同意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建议。

1934年11月14日，谢子长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，对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给予了高度肯定。谢子长还致信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，建议红二十六军北上，由刘志丹指挥陕甘边、陕北两支红军并肩作战，粉碎敌人第二次“围剿”。

1935年1月中旬，刘志丹率队从南梁来到安定。1935年腊月底正月初，马明方、郭洪涛、白坚陪同刘志丹到柳沟探望养伤的谢子长，并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，交换了意见。

1935年正月十八（或十九）那天，刘志丹到灯盏湾看望谢子长。谢子长和刘志丹一致同意要尽快成立西北军委，统一领导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。刘志丹提出让谢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，谢子长推让说：“我的伤病不好，现在根本不能工作，这副担子就由你挑，不要再挂我的名字了。”刘志丹说：“你是老大哥，是中央驻北方

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。你在陕北的名声大，人们早就称你为谢青天，只要你在世一天，主席就由你当。”并说：“你有伤，具体工作我负责，把你的名挂上。”两人为此再三谦让。最后谢子长说：“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确定你为军委主席。”刘志丹看到谢子长讲话艰难，便不再和他争，只说等到联席会议上再决定。

谢子长的支持和推荐，为刘志丹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2月5日，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峪召开了联席会议，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，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。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（未到任，任由副书记崔田夫代理），谢子长任军委主席，刘志丹任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。

“谢子长，虽死犹生”

1935年2月21日，谢子长由于病情恶化，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年仅38岁。临终之前，谢子长慈祥地对身边的家人说：“老百姓怕我死，这个心情好理解。只可惜我给他们做事太少好了。”记得那天外面下着小雪，老百姓都说：“这是老天爷为谢青天

流眼泪啊。”

1935年秋，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改谢子长的故乡安定县为子长县，永志纪念。1939年春，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谢子长的亲属，给谢子长以很高的评价。他说：“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败不丧志，真了不起呀！”同时，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墓两次亲笔题词：“谢子长，民族英雄”“谢子长，虽死犹生”，并亲笔为谢子长撰写了长达277字的碑文。

1946年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了陵园，举行了入葬典礼。毛泽东再次题词：“谢子长千古，前仆后继，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”。朱德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题词，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。

谢子长带领全家17人参加了革命，全家出了9位烈士，留下6名遗孀。为此，毛泽东在瓦窑堡时，专门嘱咐秘书黄有凤说：“要好好关照谢子长的家属，这是个英雄的家庭。”

1981年10月3日，子长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了谢子长烈士立碑仪式。我应邀从北京赶去参加了仪式。当我看到新立的毛泽东题词和碑文，看到会场上重新出现的1946年中共西北局送给子长陵的挽联原文：“一心为人民创造红地；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。”我深深意识到，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。

（摘自2017年10月12日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